

红色回忆

读《红灯笼 密战上海滩》

万丽君/文

《红灯笼Ⅱ密战上海滩》是李全最新创作的以湖州市吴兴区朝阳街道小西街人物为背景的长篇谍战小说，为小说《红灯笼》的续篇。1937年，12岁的江南少女钮佳悦为寻找当兵的哥哥钮卫国，从湖州到上海，再辗转到重庆。在战火纷飞的时代，在重重危机之下，她亲眼见证了亲人的以身殉国、慷慨赴死，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和信仰，一步步从一个不懂事的黄毛丫头成长为坚强勇敢的爱国战士。在《红灯笼Ⅱ》中，17岁的钮佳悦带着坚定的信念再次前往上海，奉党组织之命协助刘雅诗共同执行任务。她周旋于日本特高课、七十六号、军统之间，几番斗智斗勇，最后成功完成了党组织交给她的任务。

一说起“红灯笼”，我们想到的是节假日里高挂的红艳艳的灯笼，大街小巷、家家户户都会挂起圆圆的大红灯笼，特别是到了晚上，灯笼点亮的时候，更显得喜气洋洋。在作家李全的小说中，“红灯笼”已经成了一个代号，也是一个符号，是那些潜伏着的地下党员前仆后继，燃烧自己，照亮他人，他们奉献着自己的热血和青春，他们为最后的战争胜利点起了一盏盏红灯笼。“红灯笼”是谁？小说开篇，日本特高课、七十六号、军统这三方早已得知消息：延安派了一个代号为红灯笼的人来上海。他们误以为“红灯笼”还是《红灯笼》里的特工沈妍冰，按图索骥，以致最后扑空。实际上，在《红灯笼Ⅱ密战上海滩》中，钮佳悦延续了沈妍冰的代号，凭借着自己的机敏果敢、小心谨慎躲过了好几劫。

小说第一章《风一样的女子》紧张刺激，钮佳悦刚到上海，发现联络点被破坏，与之接头的刘雅诗也不知所踪。与此同时，包还被



抢，她只好东躲西藏，寻找组织，却遇上了军统特工李茜茜，险些被带走。书中几乎所有重要人物都已出场：表面上是百乐门舞女实际上是军统特工的李茜茜，日本特高课特工花野洋子，七十六号行动处副处长许一晗，干一些抢夺营生的小混混强哥，扒手阿胖，警察宋书平，还有真正的“红灯笼”钮佳悦。这些人物并不是扁平的，如李茜茜身为高级军统特工，有机警的一面，却没有特工的细致，许多任务无功而返；花野洋子心狠手辣，凶狠狡猾，不择手段，然而她曾经有过慰安妇的遭遇；许一晗色厉内荏，身为汉奸，实际

上内心也常常惶恐，她想过如果日本战败后自己的结局，可是她没有退路。在这场谍战中，这些女性角色发挥已长，为各自的阵营而努力。作者并没有将他们写得特别愚蠢，以此衬托共产党的聪明睿智，相反，几个回合下来，势均力敌，谍战戏码精彩绝伦。

1942年是中国抗日战争最艰难的一年，日军对八路军大扫荡，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红灯笼Ⅱ密战上海滩》写的正是这个时期，但作品的整个基调却并不阴森可怖。它再现了日军特高课的毒辣残忍，讴歌了共

产党员在国家危难之际的挺身而出，记录着小人物们为保家卫国做出的牺牲。

文章结尾，日本宣布投降，军统站长谷海山质问李茜茜为什么没有追查“红灯笼”，李茜茜知道“红灯笼”是钮佳悦，但她不相信她年纪轻轻有这样大的能耐，急忙圆谎躲过谷海山的质问后，李茜茜望着灰蒙蒙的天空，长长地叹了口气，然后恨恨地说：“钮佳悦，我们之间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接着，她便消失在了人群之中。可见，接下来李茜茜和钮佳悦之间还会有新的谍战故事发生，《红灯笼Ⅲ》指日可待。

诗意江南

多舛人生

读《江南·人面桃花》

阿风/文

《人面桃花》是作家格非长篇小说《江南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小说通过讲述一个官宦之女陆秀米追寻爱情和理想的故事，展示那段业已逝去的革命历史。作品把宏大的革命叙事构筑在江南如诗的美景中，更凸显出清末民初革命的艰苦残酷、革命者的勇气和局限，以及乡村大众被卷入时代洪流的无奈挣扎和多舛的人生遭际。

《人面桃花》的情节和语言是精巧的，作者在作品中的精心取景和叙事，对生活场景的诗意经营，构建起了一个诗意的江南，并与革命带来的破坏重构形成审美上的落差。少女时代的秀米天真、活泼、调皮，她衣食无忧，生活单纯，充满好奇心，她眼中的江南图景美好和谐，如“正是麦收时分，庭院闲寂。秀米抬头看了看天，没有一朵云，蓝幽幽的，又高又远”。即便在后来抗争中的内心煎熬，回归时的心如止水状态，所见也是美的，如“朗空如洗，一片澄碧，星光熹微，岸边的芦苇习习而动。阳光温煦，光阴闲静。不时有雁阵掠过树梢”。作品还写了龙藏寺、小阁楼、金蝉、瓦釜等充满诗意或富有江南特征的事物。就是书名也来自一首唐诗“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以及陶渊明“桃花源”的意象。

作品将想象中的“桃花源”与现实图景在时空上互相交融，展示了美好理想和残酷现实的冲突。秀米之父陆侃视“桃源图”为珍宝，他“要在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种上桃树”。要在普济造一条风雨长廊，把村里的每一户人家都连接起来，让普济人免除日晒雨淋之苦。当秀米初到花家舍时，她吃惊地发现父亲的愿望正在实现：“村子里每一个住户的房子都是一样的，一律的粉墙黛瓦，一样的木门花窗。一条狭窄的，用碎砖砌成的街道沿着山坡往上，一直延伸到山腰上。现实毕竟不是梦境，桃源梦最终破灭了。在王观澄和众头领因革命者小驴子的策划乱而相继死去后，最后花家舍在一场大火中灰飞烟灭。后来，陆秀米承继了父亲对“桃花源”的梦想，张季元建“大同世界”的未竟事业，以及花家舍的偶然实践，进行带有强烈乌托邦色彩的普济试验，然而最终未能实现愿望。她不是革命家，不是那个梦想中寻找桃花源的父亲的替身，也不是在横滨的木屋前眺望大海的少女，而是行走在黎明的村舍间，在摇篮里熟睡的婴儿。在理想破灭时，她彻底地否定了自己。

作者努力把宏大的革命叙事通过个体化、生活化、人性化的个体群像表达出来，展示了一众被卷入时代洪流的命运多舛的人生。作品中的人物境遇各异，没有大奸大恶，每个人都有让人怜惜之处。故事开头，当秀米问如果普济乱起来是什么样子，翠莲回答“什么事都可以预料，唯独这个乱没法想见”。这也可以作为人物个体命运走向的一个注脚。如主人公秀米经历了初恋的苦闷，出嫁被土匪抢劫，花家舍的惊变，流亡日本后的归来，创办普济学堂，幼子丧命，禁语并与女仆喜鹊相依为命生活等，直到最后，在瓦釜里看到父亲的面容后，从当年父亲幽居的阁楼里跑出来，在刹那彻悟中静静死去。又如张季元虽是个革命者，但没有被神化，其个人的欲望、革命同盟者的倒戈、革命力量的微弱等都不同程度导致了张季元革命探索的失败。再如王观澄也是个有理想追求的人，但最终丧生于革命党人小驴子策划的连环命案中。还有如薛祖彦、大金牙、小东西、彩莲等，自有其可爱可怜可恨之处，结果都是非死即走，逃脱不了悲情人生的宿命。

作者似乎在告诉读者，任是诗意江南、桃源佳地，也挡不住历史大潮的汹涌荡涤，人的发展遭际总是与当时的形势和时代相关，谁也离不开时代的设定，谁也不能独善其身，究其原因，其中既有时代发展阶段的限制，也有个体自身的局限。个体的人生如一片落叶，在历史的风浪里任由飘零、备受摧残，但必须作出选择，勇敢面对。

讲小说，也是讲生活

读《小说六讲》

赵青新/文

《小说六讲》讲的不只是小说，也是生活。

这六堂小说课体贴入微，富有亲和力。没有高头华章，没有艰深理论，没有概念术语，王安忆结合自己的生活、文学生涯，款款而谈。

翻开书的初始，我愣了愣，它不符合我的预期。最初的几篇，写得就像回忆录。王安忆说，1977年，她写下了第一篇获出版社接纳的文章，然而，因为时势弄人，这篇叫作《大理石》的散文在刊印后却不能发行，只能湮埋于故纸堆。接下来的几篇，王安忆写自己进入儿童出版社，写儿童文学，写知青生活，写早期作品的创作过程，写美国留学的启蒙，诚恳、真挚、朴实。就像每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作者走过的痕迹。

这些讲述之后，王安忆才提出了关于小说的核心理念：生活经验重要的是内心。为什么写作？很多人可能都问过自己。王安忆的回答是“我要创造，我渴望创造”。她渴望创造的是她在现实里无法实现的一种生活，无法兑现、仿佛是乌有之存在，但在某种程度上又和她的生活有关系，王安忆说，如果没有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起的情感容量，她不可能产生创造另一种存在的欲望。

对写作者而言，阅读不仅是工作，也是生活。一切都是因兴趣而生，为什么她独独对写作有兴趣呢？当王安忆谈起阅读经历的时候，我发现，这并不是埋头书斋的封闭世界，她说母语的魅力，讲起上海弄堂的市井生活，也讲到插队落户时农村里的风俗人情，她把这些观察融入了阅读，与她读过的作品相互呼应，又从

中抽离出她对童话、校园小说、爱情小说的基本看法。我觉得，这几种体裁都是成长主题的，王安忆实际上就是在讲阅读与成长的关系。

作为一个高知名度的作家，王安忆并不避讳对类型小说的兴趣。知识分子多少有精英意识，期望超出普遍性，获得更高的价值。王安忆说，阅读流行小说满足了她的娱乐享受，却不能纳入写作，因为它承担不起她的思想。但是，类型小说的技术处理，比如认识、想象、组织情节、叙事结构等，是非常好的、可供借鉴的，也是她在教授小说课程中的心得。

王安忆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为创意写作专业学生教课，课程的名称为“小说写作实践”。王安忆的课堂教学目的是尽量使他们体验小说的进程：如何开头，设定动机，再如何发展，

向目标前进。也许他们会在课堂外最终完成，也可能就此放下，她希望他们能从中受益，了解虚构写作是怎样一种经验。这些技术方法，是可以学习的，如何写小说，是可以学习的。

即使在讲授这些技术内容时，王安忆也从未离开过“生活”这个主题。正如她所说的，世事洞察皆文章，文字的表述、逻辑的追寻，可以慢慢成熟，还可以用“故事接龙”等游戏技巧或者对谈练习等方法来培养故事意识和感知灵敏度，但是，一部有生命力的文学作品，它一定来源于生活，来源于对世事的深刻洞察和对普通人的关怀。

我们为什么学习写作？王安忆最后给出的答案，仍然是：文学是很有意思的，可以帮助我们发现生活，生活其实很有意思。

守好“小门”

严格落实亮码、测温、戴口罩防疫措施